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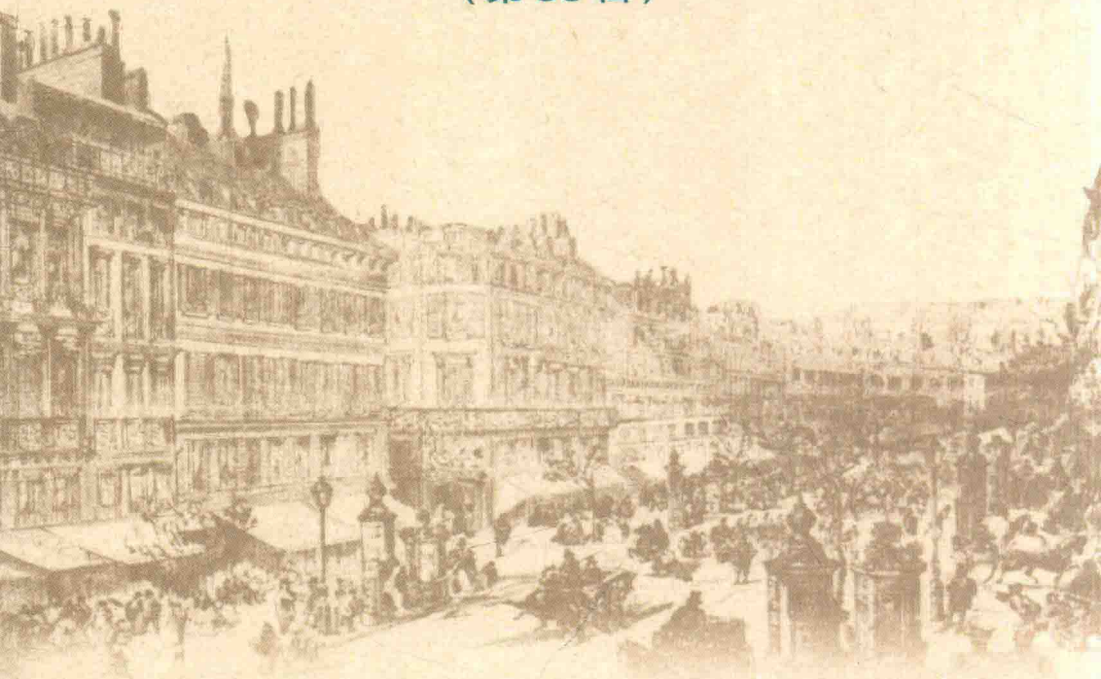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张利民 主编

URBAN HISTORY
RESEARCH

城市史研究

(第38辑)



天津社会科学院 中国城市史研究会 主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城市史研究

(第38辑)

URBAN HISTORY
RESEARCH

张利民 主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 中国城市史研究会 主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史研究. 第38辑 / 张利民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201-2457-7

I. ①城… II. ①张… III. ①城市史-文集 IV.
①C912.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3972号

城市史研究(第38辑)

主 编 / 张利民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李丽丽

责任编辑 / 李丽丽 肖世伟 汪延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75千字

版 次 /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2457-7

定 价 / 8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城市史研究》编委会

顾 问 张 健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新平 王立国 李长莉 何一民 陈国灿

苏智良 张利民 周 勇 周俊旗 涂文学

靳润成 熊月之 戴一峰

主 编 张利民

本期主编 张献忠

副 主 编 任云兰 任吉东 王 敏 范 瑛

编 辑 (按姓氏拼音为序)

成淑君 刘风华 李卫东 万鲁建 王 静

吴俊范 熊亚平 许哲娜 张献忠

目 录

区域体系与经济发展

- 从山陕会馆看清代晋商在汉口的活动 刁 莉 龚英姿 王敏芬 / 1
- 清代安徽城市发展与不发展及原因分析 何一民 胡中华 / 16
- 近代天津的妓女借贷与政府治理 冯 剑 马斗成 / 26
- 民国时期武陵山区城市数量、规模与体系的变迁 王肇磊 / 44
- 清代河南借贷行为初探 吴志远 / 57

市政建设与社会控制

- 东鸣西应：英租时期威海卫警察制度的建立与调适 刘本森 / 68
- 圯而不修：明代中都修城与地方政治 郑 宁 / 82
- 公用与民营：近代鼓浪屿租界公用事业研究 水海刚 / 97
- 上海工部局早期市政权的建立与扩展
(1854 ~ 1863) 郭淇斌 郭 倩 / 111
- 清代南京治安管理体制的演变 王玉朋 / 129
- 从平民住所制度看民国青岛对乡村移民的公共卫生治理
(1929 ~ 1937) 刘 亮 / 144

空间结构与环境变迁

- 民国时期吴县人口与城市发展 张笑川 蒋晷正 / 156
- 城居与防守：战争状态下民众避祸逃生的一个侧面
——以同治西北战争为例 路伟东 / 170

本土和全球化视野中的立德乐与《扬子江峡谷及重庆游记》
..... 周 勇 惠 科 / 185

村落还是城市：开埠前夕天津县聚落类型分析
——以《津门保甲图说》为中心 杜 晨 毛 曦 / 207

河流之“界”/“介”：城市的意义生成与变迁
——以上海为考察对象 陈 阳 / 223

社会阶层与文化教育

他山之石：基督教与民国废娼运动的兴起 张天宇 刘 平 / 249

社会变迁视角下的男性自杀现象
——以近代青岛为例 景菲菲 / 267

乡村化城市：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游人眼中的曲阜 吕厚轩 / 286

湖社画会天津分会 赵艳玲 / 299

清前期江南士子北上天津的原因分析 高 鹏 / 308

学术述评

城市人文遗产研究与保护的跨学科激荡
——“跨学科背景下的城市人文遗产研究与保护”国际学术
研讨会综述 邹 怡 / 323

“近代中国北方经济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综述 熊亚平 / 334

“近现代中国金融业发展与城乡经济”研讨会综述
..... 刘风华 郭金超 / 340

Abstracts 346

稿 约 359

从山陕会馆看清代晋商在汉口的活动^{*}

刁 莉 龚英姿 王敏芬

内容提要：清代汉口山陕会馆由于汉口特殊的商业地理位置体现了一些地域特色：依托票号实现了货物和资金的融通，依托会馆实现了晋商在汉口的城市聚集。商人以规约的形式，维护会馆内部的有序运行，同时在会馆进行商务、祭祀、戏曲和公益活动。汉口的晋商有着高度的默契和极强的群体凝聚力：太平天国时期会馆曾遇焚毁，同治九年，在山西票号领导下，商人一致同意“抽厘”，使新会馆成功落成。其间历经25年，体现了汉口晋商群体的协作精神，晋商在汉口山陕会馆的活动放大和突出了他们的商人品质，这也是晋商能在明清两代称雄国内数百年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汉口 晋商 山陕会馆 清代

清代，商业繁荣，商帮活跃，其中，以晋商实力最为雄厚，位居十大商帮^①之首。晋商经营行业广，涉及金融、茶、烟、棉布、铁货、皮毛、粮油、杂货、运输、餐饮住宿等业。晋商活动区域大，不仅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商贸经营，还将活动区域扩展至国外。他们将泽潞丝绸、解州潞盐、山西煤铁、平阳纸张等特产运销全国，又把南方的布匹、茶叶、食糖等商品运往塞北，还通过长途贩运，将茶叶和丝绸运销俄罗斯，将蒙古的牛马

^{*} 本文系山西省晋商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项目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70105。

^① “十大商帮”包括晋商、徽商、潮商、洞庭商、宁波商、龙游商、陕商、山东商、江右商、闽商。参见孔祥毅《晋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第19页。

皮毛运回内地,^①实现了“货通天下”。之后,晋商又开创了“汇通天下”的局面。自道光初年^②,山西平遥“西裕成”颜料庄总经理雷履泰创办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后,山西票号在全国迅速发展。至道光七年(1827),票号已经由京、晋发展到秦、豫、鲁等省,^③在业务上由办理国内汇兑拓展到兼营大宗存放款业务,收入甚丰。至咸丰十一年(1861),山西票号发展为11家,在全国27个城镇设立总分号数百处。^④而除在国内经营外,晋商也在朝鲜、日本等地设立票号。

依靠商贸和经营,晋商富甲一方,晋商之名享誉天下。据《广志绎》载,“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钱]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⑤晋商在商业经营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 汉口是晋商活动的重要区域

汉口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明清时期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品中转和集散中心之一。《广阳杂记》载,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⑥汉口贸易十分繁荣,“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领繁”。^⑦因此,汉口成为商业必争之地,自然而然也成为晋商活动的重要区域。

在汉口,晋商主要储存、加工、转运茶叶、丝绸、棉布、瓷器等日用百货,通过以汉口为中心、辐射四面八方的水陆路,将商品输出到张家口、归化、库伦、恰克图、莫斯科等欧亚市场。以茶叶为例,在汉口,聚

① 山西财经晋商研究院编《晋商与中国商业文明》,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第188~189页。

② 据黄鉴晖研究,“日升昌”创立时间在1823年左右。参见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第792页。

③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第792页。

④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第796页。

⑤ 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第74页。

⑥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第193页。

⑦ 乾隆《汉阳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第128页。

集了众多山西茶商。光绪七年（1881），汉口来自山西太原、汾州的茶商共38家。^①他们分成红茶帮、盒茶帮和卷茶帮三大帮，经营红茶、三九砖茶、三六砖茶、二四砖茶、半斤砖茶、贡天尖茶、千两卷茶、百两茶、五斤贡尖茶、盒茶、皮包茶等名目的茶货。茶叶多来自湘、鄂、赣、皖、川、闽等省，汇集至汉口后，这些茶商便对茶叶进行分类和分级，然后送到汉口码头，发往全国各地。

随着晋商在汉口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经营人数的增加，商人们自然而然想到联合起来，建立会馆。汉口与山西相隔甚远，背井离乡的晋商在汉口不仅语言不通，风俗不谙，而且面临激烈的商业竞争和复杂的营商环境。因此，团结起来、相互保护、共同发展成为汉口晋商的共同选择。

陕商与晋商由于生活习俗相近，口音相似，再加上历史上的人口迁移，在渊源上具有亲缘关系。因此，身处异地涉远经商时，晋商与陕商常走到一起。特别是明初设置“九边”，实行“开中制”，而“九边”中的大同、宁武、延绥、宣府、宁夏、固城等长城关塞均离山西、陕西两省较近，明代批验茶引一直在河州（今兰州），两省茶商往往相随“批引”，同到河东购盐，到南方购茶，再去西北运盐贩茶，所以情深更加谊长，这也就促成了晋商与陕商在建立同乡会上的联合。《汉口山陕西会馆志》载，“山陕，古秦晋姻好之国，地近而人亲，客远而国亲……汉上去秦晋益远，秦晋人于汉上益亲，其会而有馆也亦宜”。^②

汉口除了是晋商转运茶叶的中心，也是晋商在华夏腹地的金融中心。19世纪50年代以前，在商业发达的江南，山西票号的主要据点之一便在汉口。之后，由于汉口社会动荡，山西票号在长江流域的总管理处由汉口转移到上海，但汉口仍不失为金融重心之一。这一点从1881年汉口有山西

① 这38家包括红茶帮15家，分别为大德玉、裕庆成、宝聚公、大升玉、天顺长、祥发永、大泉玉、乾泰魁、兴泰隆、独慎玉、达顺成、久成庆、大昌玉、兴隆茂、广和兴；太原府盒茶帮23家，分别为庆丰元、长顺川、长裕川、翁盛泉、隆盛、乾裕魁、大道恒、天聚和、协成泉、祥泰厚、复泰谦、大德昌、德巨生、长盛川、兴隆茂、义泉贞、大德兴、聚盛泉、巨贞和、大湧玉、裕盛川、义生合、谦泰兴。参见高春平《晋商学》，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第213页。

② 《汉上山陕西会馆志序》，光绪《汉口山陕西会馆志》，《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1辑第7册，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第324～325页。

票号33家,而1882年上海只有25家^①可以看出。在汉口,这些票号既通过汇兑沟通汉口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又签发期票,对工商贸易者进行资金融通。比如,湘潭商号在汉口的代理人,手头并无现款,他们的主要“凭借”就是汉口的票号给予的信用支持。差不多所有运往湘潭的货物,都用汉口的山西票号签发的7天或10天后付款的期票支付。^②在汉口整个金融体系中,山西人的票号占据着主导地位。“盖自前清光绪初年,汉地已有票号二十一家……最初操汉地金融之大权者,首推票号帮。”^③这一时期,“山西人差不多垄断了(汉口)所有汇兑业务”,“商人与外埠的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它的作用几乎和英国的银行同样重要”。^④甚至“汉镇市面,银根活源以西号票借为最巨,统汉镇而言……一经西号收现,势必顷刻牵动全局”。^⑤

二 汉口山陕会馆的建设与晋商的活动

汉口山陕会馆始建于顺治年间,最初是一个关帝庙,用以祭祀晋商与陕商共同的偶像——关公。康熙二十二年(1683),以太原帮、汾州帮为代表^⑥的山陕商人购买循礼坊的地皮,在原先关帝庙的基础上正式建立山陕会馆。按行业来说,当时山西茶商各号是最主要的捐资者。按地域而言,当

① 这33家票号分别为云丰泰、存义公、新泰厚、蔚泰厚、协成乾、兴泰魁、乾盛亨、汇源涌、巨兴隆、志成信、协同庆、谦吉升、巨兴和、松盛长、协和信、元丰玖、百川通、三晋源、蔚长厚、蔚丰厚、合盛元、日升昌、蔚盛长、大德兴、其昌德、天成亨、祥和贞、大德恒、裕厚永、日升裕、蔚隆和、和盛信、义盛长。上海有前24家(三和源票号上海有,汉口无),没有后9家。其昌德、天成亨、祥和贞、大德恒是已确认的票号,裕厚永、日升裕、蔚隆和、和盛信、义盛长是不是票号仍有争议。具体参见黄鉴晖《山西票号史》,第204页。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3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第1574页。

③ 既明:《汉口之钱业》,《银行杂志》第1卷第22号,1924年,第1页。

④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3册,第1574页。

⑤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第313页,转引自《汉口商务局官商会议维持市面章程》,《商务报》第21期,1900年,江南商务局版。

⑥ 《山陕两省驻汉镇各业》,光绪《汉口山陕西会馆志》,《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1辑第7册,第342页。当时驻汉镇的各帮有太原帮、汾州帮、红茶帮、盒茶帮、卷茶帮、西烟帮、闻喜帮、雅帮、花布帮、土果帮、西药帮、陆陈帮、匹头帮、皮货帮、众帐帮、核桃帮、京卫帮、均烟帮、红花帮、当帮、皮纸帮、汇票帮。

时晋中商人是最重要的修建者。会馆馆址位于长堤街与大夹街之间，毗邻药王庙。其时，“画栋雕墙远接江城之势，丹楹刻桷平分汉水之光；对园圃而清幽花明玉树，睹香烟之缥缈佛现金身……其与晴阁鹤楼殆无异”。^①

之后，在将近两百年里，汉口山陕会馆作为山陕商人集会、议事和组织各项商务活动的场所，虽然在运行过程中遇到过不少问题，但山陕商人总是“抱团”活动，一致对外，维护会馆利益。如嘉庆年间山陕会馆曾发生一桩占地纠纷：早年山陕商人为建会馆在汉口循礼坊购地，完工后，后堤外还留有一些隙地，会馆就将其作为火路，以利人利民。嘉庆十五年时，会馆附近发生了两次火灾，受灾者来到隙地搭棚栖身。考虑到这块地与雷祖殿火路毗邻，又靠近后湖，是救火救灾要道，会馆便请示官府，将各户迁退，结果“有刁棍汪亨恺盖造房屋，延不迁退”，^②会馆于是“具稟汉阳县”，最终官府限其五日内拆屋退地。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嘉庆十九年，山陕商人特意在会馆后面立了一块后堤外禁碑，讲述了整个纠纷事件，明确指出该地产权所属，并禁止他人侵占会馆地方。由此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后来，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汉口山陕会馆遭到破坏。同治九年（1870），在票号的倡导下，大规模地进行集资重修。光绪二十一年（1895）完成修建工程。新会馆落成后，晋商和陕商开始致力于为会馆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管理制度，以实现会馆的正常有序运行，在为商人提供各类功能服务的同时，也达到约束商人行为、维护会馆秩序的目的。

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十三日，山陕商人聚集一堂，商定了一套会馆规约。笔者对规约中的部分重要章程进行分类，见表1。

表1 汉口山陕会馆规约

规约类别	具体内容
权力运行	1. 圣余堂新旧账据，重修会馆抽捐总册、收支账簿、房屋、家俱、菜园、地基、一应灯彩及银钱收支、应用人役，总归值年经营差委
	2. 大会值年，从前十帮轮流，每年二号会办，今增汇业，每年四号。以祀产新增，馆务繁繁，不如是不能董理周密也。每年以四月初八日揭清所存银两，一切祭器、祭物、文契公交下首，务期明悉周详毋延

① 《山陕西烟帮重修西会馆关圣帝君正殿记》，光绪《汉口山陕西会馆志》，《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1辑第7册，第334~335页。

② 《后堤外禁碑》，光绪《汉口山陕西会馆志》，《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1辑第7册，第333~334页。

续表

规约类别	具体内容
公产管理	3. 本会馆不准外帮借馆演戏，如有徇情私借情事，从重议罚 4. 馆内灯彩家俱，一概不准出借庙外，如违者议罚
祭祀供奉	5. 供奉香火长年神灯，迺（乃）住持应办之事，俟后逐日长香务要敬谨供奉。每逢会期，奉香献酒自必住持奉年节三天，僧人间有贪闲，假手他人，殊属不恭。自议之后，住持二人轮流执香在殿伺候以昭诚敬 6. 招僧住持，原为供奉香火，每日长香神灯务要敬谨供奉，殿宇香案，每日打扫会期期望倍加诚敬，洒扫洁净在殿伺候，以便士商恭谒，平日不得随便出外游玩
卫 生	7. 会馆重地，理宜洁净，平素日期，勿许闲人入庙游览
消 防	8. 会馆重地，灯火最宜小心，嗣后我各帮字号，如遇在馆做会演戏，客散戏终，主人务将庙院戏台一应灯烛，亲查熄灭，始准回号，以昭慎重，如违议罚 9. 水龙有备无患，倘有不测，一时出馆夫役人等资究一切照章施行
其他日常	10. 本馆晚间锁门，平日以十点钟为度，如遇宴会灯戏，以十二点钟为止，锁门后除水龙救患外，不得任意启闭出入，如违者立驱出馆。 11. 馆内不论粗细货物，概不准在内亮（晾）晒，以昭肃敬 12. 本馆司事、住持等内不准留客过宿，在外不准支取银钱货物。自议之后，倘私留客宿，私赊货物，一经知觉，逐出会馆，决不宽贷 13. 凡选用馆丁，务要小心谨慎能干办事者充之，不得轻举滥进……馆之内外门巷，每日打扫洁净，馆之祀产市屋，务听值年者调拨，催取租息不致稍懈，馆内不许容留闲人饮酒戏耍，致生事端，馆外街巷不许收荒摆摊赌博，馆役不得徇情容隐不报，如敢不守馆规，徇私偷懒，即行斥革

资料来源：《酌定条规》，光绪《汉口山陕西会馆志》，《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1辑第7册，第391~392页；《会馆公同酌定议规开列于左（续条）》，《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1辑第7册，第392~394页。

会馆的这套规约，可谓涵盖了经营管理、祭祀活动、日常供奉、消防、卫生、人员管理等各个方面，较为全面，其中蕴含了不少晋商在处理效率与公平、分工与协作、权力与责任、个人与集体关系上的智慧之道。从规约中可以看到，晋商不仅时间观念明确，如规定四月初八必须完成值年交接，晚上10点按时锁门，而且考虑问题周全，做事细致，如精心安排供奉程序，规定诸多细节礼仪。同时，又不忘努力做到相对公平，维持团结友好，如规定每年换届选举会首，须从十帮中轮流。另外，还极其强调权责统一，既规定会首执掌财务大权，又规定其每年必须“揭清所存银两”，且做了科学的内部分工，馆丁、僧人、值年、会员各司其职，“输助

有劝、捐抽有约、经理有法、修废有时、登临有赋、流览有吟、乐生有晏、恤逝有瘞……镇压有神、昭布有像、祈祝有祀、仪物有制、宴会有期、综纪有主、分行有业、法守有规、整齐有禁、岁息有产、出入有经、支销有总、增置有录，基亩券址有登”，^①使会馆能朝着按部就班、井然有序的方向前进。

在这样一套日常管理程序下，会馆可以说为晋商和陕商提供了安全、有序、卫生、规范的聚集场所。而且依托会馆，两省商人顺利地汉口进行各类活动。

（一）办公和商务活动

“西会馆者，为山陕两省士商办公之所。”^②在汉口山陕会馆，重大事务需要召开山陕大会，商人共议结果。例如会馆组织负责人以及领导机构的产生问题，就是通过集体商议来决定。在汉口山陕会馆，领导人称为“值年”，即会首，被赋予很大权力。会馆规定值年可以管理会馆簿籍银两等公共财产，并处理会馆重大事项。起初，值年一般由同乡中地位高和有声望的人执掌，后来随着会馆的发展和成熟，公举会首制逐步推行。公举虽不是选举，但形式上依旧需要得到大多数会员的认可。一般而言，被公举为会首的往往是本地有名望或是有经济地位的大商号。他们社会交往广泛，捐资多，对管理公共事务热情高，相对而言威信也较高。

在汉口山陕会馆，共有23个商帮，其中10个商帮在会馆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尤大，许多重要的条规、碑记（如公同议定抽捐条规、重修西庙春秋楼赋并序）的落款都是“山陕两省十帮同人共立”，在会馆大规模重修过程中，汇业帮的势力，尤其是太原、汾州两地的汇业，成为会馆组织的领导核心。但为避免会馆一直由某个大商帮控制，商人集体商议，值年必须每年从前十帮中轮流选拔，从而从总体上兼顾各商帮，具有一定的公平主义。同时，为保证值年交接的顺利完成，还规定在四月初八前，前任会首必须清理和核算好所有财产事务，将账簿、银钱、地产契约

① 《汉上山陕西会馆志序》，光绪《汉口山陕西会馆志》，《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1辑第7册，第324～325页。

② 张正明、科大卫、王勇红编《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二）》，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第635页。

和其他财产移交给下届会首，以保证会馆正常运行，晋商的干练和高效可见一斑。

会馆由于凝聚了大量商人和商帮，自然而然也成为商人交流商情、商议生意、调解纠纷的主要场所。以往，商人信息闭塞，为搜集商业信息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因为信息即商机。为了获取信息，商人往往“逸者常少，劳者常多，安舆出门，东听行情，西看市面，至日晡尤不得闲”。^①自从山陕会馆建成后，晋商和陕商便能更加及时地获取市场信息。并且随着各式各样的商号在会馆联结，会馆的牵线搭桥也使商人们进行生意合作更加方便，交易关系更加稳定。山陕会馆更是定期在每年五月十三关公诞辰时举办庙会，为商人交流货物、获取商机提供时机。

（二）祭祀活动

定期祭祀是汉口山陕会馆的重要活动之一。以“义薄云天”“忠义”著称于世的关公是晋商们共同崇拜的对象。之所以祭祀关公，一方面是因为关公忠义，是道德的准绳；另一方面是因为关羽是山西人，祭祀关帝有利于增强文化上的认同感，增进同乡之间的情谊。会馆中建有专门祭祀关羽的春秋楼，里面不仅供有佛像，还有僧人专门司理香火。除关公外，晋商也在山陕会馆配殿内供奉了韦驮、天后、财神、吕祖、文昌神^②等行业诸神，部分求神发财的心理有所显现。神祇殿宇均修建得十分宏伟，悬挂着众商号送的牌匾和对联。晋商对供奉神灵显得相当谨慎，要求僧人平时必须诚心供奉，烧香点灯，神殿的香案必须每日打扫干净。遇到重要日子，得奉上香，献上酒，且只能由住持进贡，才能显出对神灵的诚意。假手他人进行供奉，会被认为是对神灵的不忠和蔑视。种种细节，均显示出晋商的细致、谨慎。

（三）娱乐活动

在汉口，商人爱好听戏，便在会馆内大规模修建各类戏台，以娱乐生活，丰富精神世界。《荆沙竹枝词》记载：“各帮会馆尽堂皇，演剧最多是

^① 《助人行乐》，《申报》1872年12月7日。

^② 《西会馆地理总图记》《汉口西会馆总图记》，光绪《汉口山陕会馆志》，《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1辑第7册，第326～329、329～331页。

武昌。江图三清雄两观，道人闲散庙宽敞。”^① 山陕会馆尤其如此，逢年过节，尤其是五月十三关帝诞辰之时，都会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同乡之人在会馆欢聚一堂，聚酬演戏。戏曲内容多为家乡戏，如秦剧、山西梆子。据潘长学、徐宇甦研究，汉口山陕会馆可能建有七座戏台，分别在正殿、春秋楼、财神殿、天后宫、七圣殿、文昌殿和怡神园内。^② 据田联申^③研究，汉口山陕会馆戏台还是开彩重地，其搜集到的一张老照片显示，戏台上工作人员在开彩，台下彩民人头攒动，蔚为壮观，可见商人生活丰富多彩。对于戏台，会馆管理甚严，对内要求戏演完后主人必须亲自确保灯烛熄灭才可离开，否则严加惩罚，体现了晋商先行的防火防灾意识；对外戏台概不借出，只能提供给本帮人演戏，体现了作为特定商业群体集体主义的排外性。

（四）公益活动

选择背井离乡来汉口经商的山陕商人数量众多，他们客地经营，借地生财。但市场风云不测，因经营失败上吊投河的大有人在；因身疲心累、孤苦伶仃而病死的更是司空见惯。山陕会馆《重建瘞旅公所记》载：“我山陕之人寄此汉江之地，不远千里，本冀锦旋。诂料无常，忽遭魄落，虽存亡有数为斯世之常然。”^④ 为此，商人抱团自救，聚集起来，为自己提供后援保障。通过购买瘞所、义园的方式，为同乡安置施梓。《重建瘞旅公所记》载：“汉口山陕会馆建有泰山庙西为瘞旅之所，为厝柩之所，更置义地一区，在汉阳七里庙地方。良以两省之人贸易于斯者盈千累万，疾病死亡在所难免。有义阡以埋葬，有公所以行柩，并取费资以展时祀。”^⑤ 对于义园、瘞所，会馆形成了一套规范的管理制度。《公所议定章程》规定：“旧例旅梓以五年寄顿，俾死者之家遣人携带回籍或其家人无人闻问，五年后即代为安葬义地，标石立碑。公所存寄灵柩每年清明中元寒食三节必

①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第4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第2646页。

② 潘长学、徐宇甦：《汉口山陕会馆考》，《华中建筑》2003年第4期。

③ 田联申：《图说汉口山陕会馆》，《武汉文史资料》2016年第5期。

④ 《重建瘞旅公所记》，光绪《汉口山陕西会馆志》，《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1辑第7册。

⑤ 《重建瘞旅公所记》，光绪《汉口山陕西会馆志》，《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1辑第7册。

施食超度。并形成寄厝执照的管理制度。”^① 平日里,会馆对生病的会员“相倾体恤”,提供钱财、药物上的支持;对年老失去工作能力者给予救济;对穷儒寒士也提供方便,实现了“伤有所疗、老有所养、死有所葬”,体现了会馆的“以人为本”理念和浓厚的个人关怀。

三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会馆的变迁与晋商的活动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汉口以及山陕会馆可谓经历了一场重大浩劫,在此过程中,汉口山陕会馆遭遇焚毁,而商人们不惜斥资重建,历经30多年,终于在前人奠基的基础上,新会馆落成,规模宏大,堪称典范。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两广、两湖、沿长江中下游以及江、浙、闽、赣等省的商业活动受到重大影响,各地经济几乎陷入停滞。^② 咸丰二年(1852),战火蔓延至武汉,汉口及其周边地区经济受到巨大冲击,社会动荡不安,交通阻滞,商路颓废,商人纷纷逃离,工商业凋敝,金融死滞,票号受挫。汉口的票号在山西总号的指示下纷纷撤离,迁往上海。也正是在这一年,太平军在连攻湖北重镇汉阳、汉口后,汉口山陕会馆被太平军占领,成为天王洪秀全指挥进攻武昌的大本营。至咸丰六年(1856),太平军已先后三次攻克武昌,四次占领汉阳、汉口。而汉口山陕会馆也于咸丰四年(1854)惨遭焚毁。《汉口山陕西会馆志》载,“被毁于咸丰甲寅,粤匪蹂躏武汉,大肆焚掠,合镇皆成劫灰,而会馆亦烬矣”,^③ 实为可惜,令人嗟吁。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汉口的商业贸易开始恢复,特别是1861年汉口对外开埠后,晋商重回汉口,看到焚毁的会馆时,“满目萧然,不禁感极而悲矣”,^④ 内心极度希望重建会馆。同治二年(1863),山陕的烟帮开始着手修复关圣帝君正殿,而药帮则着手修复武圣殿,此时距1857年太平军

① 《公所议定章程》,光绪《汉口山陕西会馆志》,《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1辑第7册。

② 董继斌:《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第173页。

③ 《汉口重建西会馆碑记》,光绪《汉口山陕西会馆志》,《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1辑第7册,第334~335页。

④ 《山陕西烟帮重修西会馆关圣帝君正殿记》,光绪《汉口山陕西会馆志》,《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1辑第7册,第339~340页。

退出武、汉、黄之地，汉口“民人商贾尚未复业”^① 不过寥寥数年，商人和商业极强的自愈性可见一斑。但由于会馆修建工程过于浩大，两帮商人只能“徒唤奈何”。^②

在汉口晋商中，相比于其他商帮，汇业（票号）实力最强，号召力大。动乱过后，撤走的山西票号已在汉口重新设庄，其总数量甚至成为全国城镇之最，且日益有了起色。《汉口之钱业》载：“汉口因地位关系，在昔即为吾国中部之重镇。至咸丰八年（1858），依《天津条约》，辟为商埠，而商业愈盛，金融界随之益见起色……江西、山西、陕西等省商人，又源源而来，开设票号与银号。至光绪初年，已有山西帮票号二十一家……为金融界之重心。”^③

在“目睹旧址残缺殆甚”^④ 后，同治九年（1870），以武有庆、赵淑智为首的汇业（票号）倡导两省商人开始大规模地集资重修。^⑤ 到光绪二十一年完成重建工作，新会馆落成。《汉口重建西会馆碑记》载，“是工兴于同治庚午闰十月初二日，讫于光绪乙未七月，总期二十五年，共费银二十七万一千六百余两”。^⑥ 在此过程中，山西票号承担起大量责任。据黄鉴晖统计，^⑦ 自光绪七年（1881）到光绪二十一年，各商号筹集布施，募化和开光银共计249068两8钱3分，其中36家山西票号共计筹捐74412两8钱1分，占29.88%，接近1/3，可见票号于会馆修建之贡献。而为了纪念汇业帮经理武有庆为建设会馆所付出的心血，山陕商人还在会馆的文昌阁右边特筑了一个小厅，安放武有庆的劳绩牌。《西会馆地理总图记》载，

① 董继斌：《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第177页，转引自清档，湖北巡抚胡林翼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折。

② 《汉口重建西会馆碑记》，光绪《汉口山陕西会馆志》，《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1辑第7册，第334～335页。

③ 转引自杨荫溥《中国金融论》，黎明书局，1931，第312页。

④ 《汉口重建西会馆碑记》，光绪《汉口山陕西会馆志》，《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1辑第7册，第334～335页。

⑤ 据《汉口重建西会馆碑记》载：“庚午岁，汇业诸人目睹旧址残缺殆甚，慨然伤之。始邀两省众商合谋共议，量力捐资，而汇业武君有庆，赵君淑智等倡首建修。”参见《汉口重建西会馆碑记》，光绪《汉口山陕西会馆志》，《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1辑第7册，第334～335页。

⑥ 《汉口重建西会馆碑记》，光绪《汉口山陕西会馆志》，《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1辑第7册，第334～335页。

⑦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第1254页。